

两位南宋宗室成员首次“同框”，照见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

衣橱里的江南



螭纹合香璧。



环编绣丝履。



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。



透雕满池娇金钗坠。



双鱼纹金鱼袋饰。

■ 本报记者 李娇伊 通讯员 李晓雯

推开中国丝绸博物馆临展厅的门，两座来自南宋的地下衣橱缓缓开启——“五一”假期里，不少人来打卡这场名为“打开南宋的衣橱”的展览。

展厅一侧是黄岩赵伯澐的衣物：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、圆领提花罗夹衫，颜色素净，线条端方。另一侧是福州黄昇的妆奁：山茶纹罗描金彩绘花边单衣、烟色罗广袖袍，五色斑斓，华美绚烂。来自福建博物院、黄岩区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83件/套珍贵文物，让两位从未谋面的南宋宗室成员首次“同框”。透过他们的衣橱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美学，也读懂了一个关于宋人南渡、扎根、融合的故事。



“打开南宋的衣橱”展览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衣裳中的“南渡缩影”

“研究南宋服饰，不能用边缘地区出土的文物来谈中原的服装，也不能用布衣来代表整个时代的风貌。”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、策展人郑嘉励说，“赵伯澐与黄昇，一位是黄岩宗室，一位是福州宗妇，在地方上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士绅之家，也是学术世家。他们与当地最有势力的新兴官僚结合，其服饰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。”

2016年，浙江黄岩屿头乡前礁村，赵伯澐墓被发现。这座古墓出土丝绸服饰70余件，被国内外专家称为“宋服之冠”。

赵伯澐，字子正，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。靖康之变后，北宋宗室南渡，分为三支：太祖后裔为“南班宗室”，太宗后裔为“南外宗正司”，魏王赵廷美后裔为“西外宗正司”。赵伯澐属太祖一脉，其父赵子英是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宗室进士，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任黄岩县丞，举家从开封迁居黄岩西桥（今桥上街）。

从此，这一支皇族血脉，在浙东小城落地生根。

赵子英卒于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，墓在黄岩灵山乡。距其徙居黄岩不过四十年，服务于墓地的田产合计已超过450亩，足见赵家之富裕。1196年，赵伯澐主持重建五洞桥，“视旧功十倍焉”。嘉定年间的地方志《嘉定赤城志》，称其为“县人赵伯澐”——这个从开封南迁的宗室后裔，已然融入当地。

到第三代，赵师渊、赵师夏等七人师从朱熹，赵师渊执笔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，开创中国史学“纲目体”三大体例之一；赵师夏娶朱熹长孙女，朱熹亲自为其撰写《赵婿亲迎礼大略》。西桥赵氏“一门廿八进士”，皇族后裔变成了理学世家。

黄昇（1227-1243）则走了另一条融合之路。

1975年，福建福州北郊浮仓山，黄昇墓被发现，随葬器物436件，其中服饰和丝织品354件，几乎囊括了南宋女性服饰的所有品类。

黄昇的丈夫赵与骏出自宋太祖后裔，他的祖父赵师恕晚年任南外宗正司知事，主管泉州宗室事务。黄昇之父黄朴是绍定二年（1229年）状元，曾任提举泉州市舶。由此我们看到一起宗室与新兴官僚的联姻：一方是南渡后分散于闽地的皇族后裔，一方是凭借科举崛起的地方精英。他们通过共同的理学师承联结在一起——赵师恕与黄朴的老师都是黄榦，而黄榦则是朱熹的女婿。

宋室南渡以后，宗室迅速地方化、士绅化、士大夫化。“北宋的宗室集中在开封、西京、南京三地，南宋的宗室却分散各地，与地方精英联姻，通过科举入仕，深度融入地方社会。”郑嘉励说。

展板上，写着朱熹为西桥赵氏家祠题写的那副对联：“礼乐诗书科甲第，金枝玉叶帝王家。”上联言其士大夫化，下联言其宗室血统。十六个字，精准概括了南渡宗室转型的本质。这一次深刻的身份转型，让天潢贵胄真正



圆领素罗大袖衫。

成为江南水土的一部分。赵伯澐和黄昇的人生故事，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缩影。也因此，他们的衣橱才格外代表性——每一缕丝线里，藏着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日常，更是一个时代在江南落地生根后的生活美学与精神图谱。

南宋官员的“行政夹克”

在这场展览中，不少人发现，原来南宋的官员也有自己的“行政夹克”。

赵伯澐的圆领素罗大袖衫，就是那个时代的标配。直角幞头、圆领大袖，长度垂至脚踝，腰系金带或银带区分等级，手持笏板，脚踏乌靴——这既是服饰，也是身份与秩序的直观表达。

元丰改制后，宋代公服以三色区分：四品及以上服紫，五、六品服绯，七品及以下服绿。

赵伯澐生前官至文林郎，正八品，按南宋公服制度，公服为绿色。他死后追赠四品，公服为紫色。墓中出土的圆领素罗大袖衫，原为绿色，因被地下水浸泡了数百年，颜色变成了现在的黄色。与他一同入殓的素木笏板，也印证了他以八品官阶下葬的事实——按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，九品以上、四品以下用木笏。

黄昇衣橱里的色彩则要丰富很多。最引人注目是那条印金双凤穿牡丹百褶罗裙，裙身百褶细密，裙摆印金双凤穿行于牡丹丛中，富贵而灵动。同墓出土的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，展现了南宋最奢华的服饰工艺——“印金填彩”。

这套工艺极为复杂：先在硬质木板上雕刻

阳纹图案，用纯金掺以银、铅、硅等元素调制泥金，然后在丝织物上印出花卉轮廓，最后敷以色彩。这种“销金”工艺因耗费珍贵金属，南宋朝廷多次颁诏禁止民间使用。

贴金的衣服，如何洗涤？郑嘉励的回答有点“恼人”：“这种真正的奢侈品，可能本就不需要清洗。”

可以说，黄昇一年365天，天天都穿新衣。她也因此被很多网友称为南宋的“时尚一姐”。而且，她虽无命妇封号，却享有远超一般命妇的厚葬规格。专家推测，原因就在于其娘家“家底丰厚”。其父黄朴任提举泉州市舶，专擅海外贸易之利，堪称“肥差”；夫家赵氏所在的泉州，是南宋最大的贸易港，丝织品正是外销大宗。墓中出土的部分织物质书题记“宗正坊染金丝绸官记”，正是南外宗正司下辖作坊的产品。

而在衣裳的工艺细节里，藏着另一个时代的织造密码。

黄昇墓出土的深褐色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.7克，“折叠起来能够放进火柴盒”。其材质为四经绞罗——罗织技艺的巅峰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描述福州织造丝织品“举之若无，裁以为衣，真若烟雾”，正是这类罗衣的写照。

北宋靖康初年，京师妇女喜爱以四季景致为纹样，从丝绸绢锦到首饰、鞋袜，“皆备四时”；把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等四季花朵图案，“皆并为一景”。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，称为“一年景”。

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中，有多件刺绣纹样

几乎囊括了“一年景”里的所有花卉，包括荷花、山茶、杜鹃、桃花、菊花、蔷薇、芙蓉、石榴、秋葵、海棠、牡丹等。其中一件绶带上，刺绣纹样包含了十八种四季花卉。这也是“一年景”纹样最完整的实物例证之一。

“一年景”的出现，反映了宋代审美从唐代概念化向写实化的转变。宋人喜欢将四时花卉体现在吃穿用度上，这与理学的“格物致知”精神相通——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，本身就是理学的精神底色。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花卉集于一身，也暗合了理学“万物一体”的宇宙观。

一件衣物，不仅展现了南宋织造工艺的巅峰，更是宋人审美趣味与精神世界的物质见证。

腰间，挂着礼制与风雅

穿过展厅，那些历经千年仍未损毁的衣物，正无声地还原着南宋士大夫的生活。

男性官员着公服时，是礼制秩序下的庄重形象；休闲时，他们则换上“套带”——系于腰间的一种丝质束带，上面的香璧自然下垂。

赵伯澐墓出土的螭纹合香璧，历经十年修复，首次展出。其正面浮雕为一条匍匐爬行的螭龙，背面光滑无纹。它并非寻常玉器，而是由多种香料调和而成的合香制品——似木非木，不见纹理，出土时呈饱水状态，修复后表面龟裂，露出米黄色本质。

宋代文人的合香之法，原随佛敎东传而来，至南宋已完全本土化。香璧佩戴于腰间，行走时香气幽微，是燕居焚香、澄心悟道的物化体现。

女性盛装以“大袖”配“霞帔”为标志。黄昇墓出土的大袖衣后背有三角形兜袋，用于收纳霞帔的两条长带。霞帔垂于身前，底端系一枚钗坠，依靠重力保持平整，行走时“叮叮当当”。这既是装饰，也是约束——走路时要小步走，才是大家闺秀。

钗坠的材质有金、银、银鍍金和玉，形状多为滴珠形或圆形，图案以禽鸟、花草、游鱼为主。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的一枚银鍍金钗坠，上面的纹样格外特别——“转官”二字之下，系着一枚圆球形纹饰，叫作“转官球”。

所谓“转官”，指官员品级的逐级晋升，是南宋官场最牵动人心的两个字。那时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，只是拿到了做官的“入场券”，先要担任选人——也就是基层文官，俸禄微薄，升迁艰难。只有“改官”，从选人升为京朝官，才算真正进入官僚体系的核心层，俸禄、前途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南宋后期“员多阙少”，选人动辄要等十几年才能改官，多少人从青丝熬到白发，就盼着那一纸文书。

于是，“转官球”成了那个时代最热门的吉祥纹样。它出现在女子的钗坠上，出现在墓室壁画里，还出现在文人的案头清玩中——既是对丈夫或父兄仕途的殷切期盼，也是整个家族对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执念。黄昇的父亲黄朴是状元出身，一路做到提举泉州市舶，是“转官”成功的典范；而她的丈夫赵与骏，年纪轻轻，还只是文散官的最后一阶将仕郎。那枚钗坠，或许正是这个家族对未来的某种期许。

一边是焚香默坐的风雅，一边是奔走干谒的焦灼。礼制与风雅，约束与期盼，就这样被南宋的士大夫们穿在身上、挂在腰间，落地生根。

延伸阅读

华服里看世界

服饰与织物，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与文化密码。这些举世闻名的衣物珍品背后，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素纱单衣
两千年前的“高定”

素纱单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，墓主人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，生活年代距今已有2200多年。素纱单衣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，也是目前最早、最薄、最轻的服装。

辛追的“高定”华服素纱单衣共有两件，一件是直裾，一件是曲裾，都是右衽。其中，直裾的是49克，衣长128厘米；曲裾的是48克，衣长160厘米。曲裾的素纱单衣在工艺上相对更高超，因为它更长、更宽，却还轻1克。直裾素纱单衣在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中常年展出。

古人形容衣物“轻纱薄如空”“举之若无”，绝非虚言。这件衣服是辛追夫人的一件“罩衫”，穿在色彩艳丽的丝绵袍外，使华丽纹饰若隐若现，完美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。

刘胜金缕玉衣
帝王的永生之梦

在河北博物院的展厅里，一件由2498片玉片和约1100克金丝编缀而成的金缕玉衣，静卧于恒温恒湿的展柜中。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殓服，1968年出土于满城汉墓，全长1.88米，是中国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、规格最高、最完整的玉制葬衣。

汉代人认为“金玉在九窍，则死人为之不朽”，玉衣便是这一观念的极致表达。刘胜的金缕玉衣按照人体形状制作，每一片玉都经过精细打磨，四角钻孔，用金丝编缀成衣。早在4000多年前，良渚文化已有玉殓葬的萌芽；到汉代，玉衣制度臻于完备——皇帝用金缕，诸侯王、列侯用银缕，大贵人、长公主用铜缕。刘胜以诸侯王身份僭越使用金缕，折射出西汉中央与地方诸侯的权力消长。

玉衣出土时，刘胜的遗体早已腐朽无存，但金缕玉衣本身，足以让人想象2000多年前那个痴迷永生的时代。

图坦卡蒙黄金饰品
法老的衣橱密码

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，法老图坦卡蒙的宝藏占据着最显眼的位。这位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的少年国王，陵墓是卢克索国王谷中最小的，随葬品却极为丰富。5000多件陪葬品中，纯金面具和纯金人形棺早已闻名世界，而一批服饰随葬品却在库房里沉睡了近百年，直到2017年才在埃及博物馆首次公开亮相。

经修复后亮相的80多件精美黄金饰品，形状大小各异，纹饰题材多样，既有圣甲虫等古埃及传统元素，也有地中海东岸风格的动植物形象，反映了古埃及文明与古代西亚文明的交流。这些黄金饰品包括胸饰、项链、腰带等，是法老衣橱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古埃及信仰中，黄金是“众神的血肉”，穿戴黄金饰品不仅能彰显法老的至高权威，更被认为能在死后给予庇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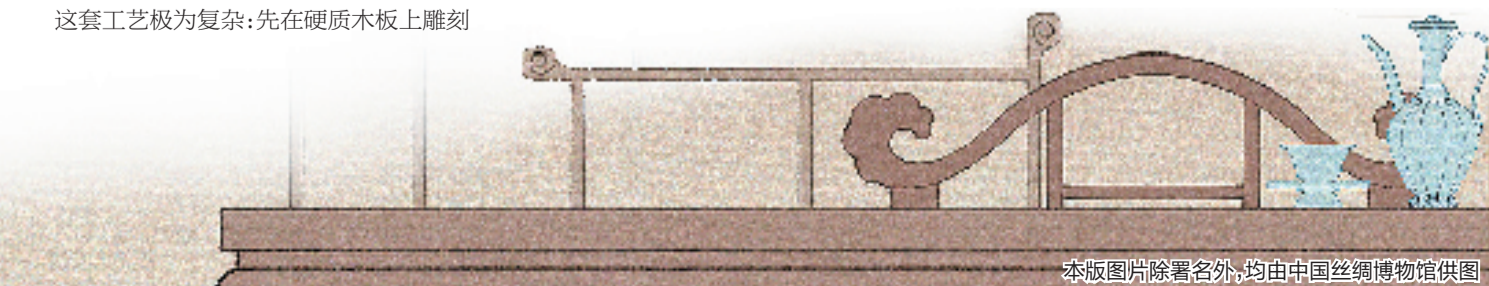
拿破仑加冕长袍
法兰西的权力宣言

法国科西嘉岛阿雅克肖市费斯奇宫美术馆，藏有法国画家弗朗索瓦·热拉尔于1806年创作的名画《拿破仑加冕礼》。画的正中央，拿破仑身着加冕礼服，红色丝绒长袍上点缀着金色蜜蜂图案，镶有白黼皮里子的。

长袍上的每一处细节，都是拿破仑精心设计的政治符号。红色丝绒取代了法国旧君主的传统蓝袍，金色蜜蜂取代了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纹饰——蜜蜂象征着勤勉和新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，白黼皮则是欧洲王室最高等级的象征。

1804年12月2日，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为自己举行了加冕典礼——按照传统，应由教皇为他加冕，但他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，自己戴在了头上。这一“自我加冕”的举动，震撼了整个欧洲。

（本报记者 李娇伊 综合整理）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